



红军

1934-1936

编著 师永刚 刘琼雄

1 9 3 4 - 1 9 3 6

红军

编著：师永刚 刘琼雄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军：1934 - 1936 / 师永刚、刘琼雄编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10

ISBN 7-108-02587-6

I. 红… II. ①师… ②刘…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 - 1936) - 史料
IV. 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4005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图文制作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7.75

印 数 00,001-15,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红军青年将领张爱萍（中）、刘亚楼（左）、莫文骅（右）1937年在延安。张爱萍的上衣在当时引领时尚。



红军将士童小鹏、陈赓、邱南章，长征胜利后在洛川。时间是1937年5月。
背后是当时苏区还很稀罕的大卡车。



红军青年战士在陕西富平。70年后的今天，宛若群雕（1937年）。



我们为什么要重新
回忆红军？

00





1

周年是中国人对于已故往事追根溯源的机会之一，回忆传统几乎同样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这种对于历史的温习正成为一种潮流。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人集体回忆的姿态。2006年是红军长征70周年。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重要开始。

这个奇迹其实早就开始被纪念了，只是时间坐标发生了变化，纪念的队伍里不断出现新的声音。如同仍然活着的、参加过那次长征的长寿的士兵们，喜欢穿着当年的军装；他们的后代，现在的年轻人，被电视与流行风格混搭而成的一代，他们对于那场长征的认识，却有着不一样的方式。

在领袖发表国家级的演讲来记忆的时候，年轻人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那段故事的。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女孩子，一个徒步爱好者，她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了自己沿着红军路线行走的全过程。她感受到的只是这段路途竟然有一半是人类的秘境，从未被污染，景色美得惊人。她认为，自己的爷爷，他曾是红军，比她要浪漫；她不再认为，那段历史像爷爷所说的艰难困苦——吃青稞算什么，那种味道美极了。新一代，当然，我们还曾在20世纪80年代，被崔健的小号与红绸带迷惑，他嘶声呐喊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及粗嗓音的《南泥湾》。革命被音乐给弄得更加浪漫。但崔健们显然落后了。民间自发的对于那支军队的兴趣与爱好，正在成为一个潮流。在许多的网页上，以及更多的幼小的孩子们的留言与思考中，长征正在被形式化，红军也成为某种先锋名词的代表。一个“80后”试图将自己的乐队命名为红军，因为他认为这个名字太酷了，最终遭到有关方面的反对。有个

酣战直罗镇

会宁

吴起镇

六盘山

激战腊子口

阿坝

毛儿盖

夹金山

懋功

岷山

飞夺泸定桥

强渡大渡河

安顺场

四渡赤水

彝海结盟

会理

巧渡金沙江

延安

娄山关

遵义会议

强渡乌江

湘江战役

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



做服装设计的女孩，则放大了一张当年的红军战士穿着短裤的照片，看上去类似今天的七分裤。这张照片放在她的店里，与奢侈品放在一起，酷得要死。

更酷的是，有一个人花更多的时间，拍了将近一千名流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画像，结集出版，并把这当成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在北京的798工厂，先锋、爱波普的艺术家们，更是长征以及红军的爱好者，他们放一支当年的大刀在自己的画展上。有个艺术家甚至在以贩卖真假古董而闻名的潘家园市场找到了一批描写红军的古老版本，合成了一张《潘家园的长征》。

红军在70年后的今天，在官方与民间，在时尚与传统，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中间，成为一个有趣的纪念对象，他们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甚至互相印证。

90岁，80岁，70岁，60岁，50岁，40岁，30岁，20岁，10岁。这样一个年龄的纵深与横切面。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传统与现代共存，丰富而纷杂，单纯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同样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他们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

2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2006年的中国，最大的相同点很快出现了。

许多来自西方的目光，以记者的好奇审视着中国，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一切产生兴趣。

早在可以乘波音飞机来到中国的时候，时间与空间一下子缩小了。中国的历史很快被这部分人目击，甚至描述。纽约与北京，华盛顿与南京，纽约与延安，伦敦与上海……打开30年代亨利先生的《时代》杂志以及更多的书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人笔下的中国是如此令人眼花缭乱，如此丰富。甚至在今天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作为全球化背景记述中的一环，一个部落。而这个部落的历史，因为西方的观点以及立场而变得张力十足。甚至你找不到这个曲线的根本变化。这些提前感受到全球化背景与拥有对世界好奇心智的西方冒险家，找到了对于中国的认识方法，甚至

想帮助中国认识世界以及自身的历史。

历史的写作往往有多个版本，有的由官方审定，有的来自民间，还有的由外国人记录。这些版本适合一起阅读，相互映照。这种阅读反而会使历史更具备完整性。20世纪30年代，那场巨大的青春赤色革命，其中一位真正的记录者就是斯诺。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辗转来到延安——在当时，去延安比去西藏更艰难，在这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待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白晋是法国传教士、康熙的老师，曾著《康熙帝传》），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埃德加·斯诺的旅行，差不多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到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这些“朝圣者”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间访问中国红色根据地。在他们的笔下，位于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就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森（20世纪30年代美联社驻中国记者）所说，“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而描述红军长征史，则成为这个奇迹的某个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历史引人入胜，是因为他们将中国放在一个变化的全球图景中来看待”。

那个时代的传说中的让西方恐怖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

斯诺称：“在世界各国中，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斯诺看到的那些红军，是这样一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先进性的军队。在1927年之前，共产党员是允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清除。这是为什么？热情的斯诺是带着无数的疑问走进苏区的。这些问题包括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么娱乐、恋爱、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吗？至少有上万个疑问，成为重要的理由，促

使斯诺发誓要亲自去看看。

而对于历史来说，一切的质疑不过是回到常识的开始。

这本回答这些单纯问题的书出版后，《时代》杂志在1938年，即长征结束两年后，红军的名称彻底消失，被称为八路军的时候，用了几个版面，大方地夸奖了这个红色的政权。

歌德曾称历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磨盘转动的声音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认识。任何伟大的故事的开端总是因为有着优异的敌人或者对手，有着众所周知的恩怨、党争、伐异、立场、主义、兄弟或者江山。历史总是由两个人结成同盟，上演各种不同的戏剧。这两个人分别被对方称之为敌人，或者对手。毛泽东的敌人当然是当时强大的蒋介石，这也使这场戏剧的一开始显得有些非常不对等：一支流亡的部队，仍然没有形成核心，处在边缘立场，多灾多病的毛、朱们；而1934年的蒋介石兵强马壮，良将无数，精兵在手，拥有政府和大多数亲政府的媒体。但故事的开始与结束总需要时间来点评，如果蒋在1927年清党到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就知道结果的话，他还会发动清党、杀戮共产党人、拒绝无数次试图和解的共产党员们吗？如果是另外的写法，长征的结束与开始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历史可能会以另一行诗句开头。

但这行诗的写法显然属于毛泽东的格律。

在这场没有开头，也不知道目的地与结束的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进行的将是一次漫长的长征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对手的“帮助”下，一步步地走到了世人瞩目的顶点。

茨威格在陈述他为何要写《人类群星闪耀时》的理由时称：“……正如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将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就像避雷针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挤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悠悠、按顺序发生的事件，也都往往压缩在这最短的时刻发生。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段话语言定义得好极了。

长征真的在改变着民族的命运。

一切的发生都在无意甚至被迫中。李德与他的助手决定进行长征，一切都在神秘地进行。毛泽东最初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这场好戏其实差一点并不是以他为主角。

那条路，一直在无意中决定着路线。在这条寻找生存的路上，毛泽东与他的队伍，一直在修正着自己的方向，整整两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才决定了这条路的终点，或者起点。

3

与长征同时的这个时代，西方人曾称之为中国的“黄金年代”。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陆续登场，并且在文化上创造了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某个角度看，文化奇迹、政治变迁、战乱、西方常识、英雄、汉奸、国难、上海、日本人的威胁，一切的一切都令人目不暇接，奇迹与失败的声音如此交替，光荣与梦想……

鲁迅，这个探索者，据称当时给红军发了一封贺文。

胡适正在创造着新的哲学。

梅兰芳在访问苏联，李叔同（弘一法师）在弘扬佛法，沈从文刚刚成名，顾颉刚就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傅斯年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视察殷墟最大一次的发掘。邹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他的《生活周刊》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纪录，陶行知主编《小先生丛书》，徐悲鸿在苏联巡展，丰子恺在杭州租了别寓，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和《神女》，被认为是中国无声片时期表演艺术的高峰，曹禺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日出》和《原野》……

梁漱溟，张元济，黄炎培，林徽因，梁思成，郁达夫，林语堂，冯友兰，马一浮，巴金，吴清源，俞平伯，费孝通，齐白石……

仅列出这份挂一漏万的名单就可以对那个30年代鞠躬了。

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已到过未来，如同那个鲁莽的美国人，他把去苏联当成入

类的未来。30年代纽约的知识分子处在对于莫斯科的集体想象中。而在中国，正在呈现思想的两个分支，一群人集体倾向纽约，另一群人，则视莫斯科为圣地。

这种传统使30年代充满了矛盾与活力。纽约的思想与莫斯科的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未来的两种选择。

这两种选择同样成为国家30年代思想界与军事家们的主流生活。

斯诺说：“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9年以来一直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中而与世隔绝。”但这帮行进在路上的穷人们，却在寻找着中国的“历史的方向感”。

苏联来的顾问显然不是这个方向的制定者，但美元显然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些就是我们试图看清楚的30年代。

那里面有红军，有他们进行的长征；也有中华民国，租借地，纽约来的投机者，苏联人；共产党正被国民党追击；一个放在一张统一的中国地图上的30年代。虽然事实上，中国在30年代是分裂的，红军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许多省并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中。

过程永远都是谜。

30年代的描述亦如此。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每一代执笔者也都是如此。被重复过千万次的真理称——历史就是当代史。每一代人都在按自己的需要完成历史，观照现实困境。70年，几乎是下一个百年的倒计时，再过30年，这些曾发生的事实，还会被记录吗？或者被如何记录呢？

名 称：长征

行进者：红军

路 程：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红军四支队伍合计行程六万余里

时 间：1934.10—1936.10